

WOZAI
XIZANG
DANG
JIZHE



我在西藏当记者

李佳俊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我在西藏 当记者

李佳俊 著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西藏当记者/李佳俊著.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80253 - 333 - 2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通讯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新闻报道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5206 号

我在西藏当记者

李佳俊 著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字 数 442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3 - 333 - 2/I · 105
定 价 48.00 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 dfhw@zzcb.com.cn 电话: 010 - 6489290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无怨无悔的岁月

岁月往事细品味·····	(2)
三十余年高原梦·····	(11)
我怀念那座小楼	
——在热振林卡的日子·····	(14)
永恒的思念	
——回忆在《西藏文学》的日子 ·····	(22)
这次,也说说自己那些陈芝麻烂事 ·····	(42)
镜子前的对话	
——我的文艺评论生涯·····	(67)

阿里留踪

说来你也不相信	
——回忆在阿里采访的日子·····	(77)
阿里军魂	
——李狄三和他的战友们·····	(86)

附件:关于李狄三等烈士墓的调查报告	(101)
寻找英雄路漫漫	
——回忆采访阿里先遣连的前前后后	(106)
翻身牧民的带头人	(129)
喜看深山革新花	(137)
班公湖畔创业人	(142)
我们是“阿里人”	(146)
阿里不再遥远	(161)

他们的名字叫“老西藏”

进军路上,那个年龄最小的女兵	
——高世珍(格桑卓玛)访问记	(171)
雪域公路交通的开拓者——侯杰	(183)
怀念女诗人杨星火	(197)
驰骋高原文将军	
——读《雪域放歌》想到夏川其人其事	(202)
他耕耘在这片土地上	(207)
一个西藏老兵的足迹和眷恋	(211)

在希望的田野上

雪原上,一串闪光的脚印	(222)
揭开藏医学之谜	(265)
夺取金牌的人	(282)
铁饭碗 银饭碗 金饭碗	(290)
笑在最后,笑得最美	(302)
墨洒高原写春秋	(318)

目 录

不寻常的演出	(327)
在希望的田野上	
——再访乃东县结巴乡	(336)
林海中崛起的新城	(343)
三年春雨涌新潮	(3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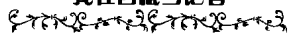
走遍雪域,古刹风光看不够

揭秘雍布拉康	
——西藏“第一座房子”访问记	(359)
昌珠,大昭寺的亲妹妹	(363)
桑耶寺,西藏佛教第一寺	(369)
夏鲁寺,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	(381)
敏珠林寺,藏传佛教著名学府	(389)
一代兴衰,尽付落照残壁	(395)
白居易,各教派在这里和睦共处	(403)
西藏有座十万佛塔	(408)
哲蚌寺,世界最大的佛教寺院	(413)
神秘的野玫瑰	(419)
一座用黄金包裹起来的寺院	
——扎什伦布寺巡礼	(424)
泽当寺话古	(437)
魔女洞下的尼姑庵	(440)

文海拾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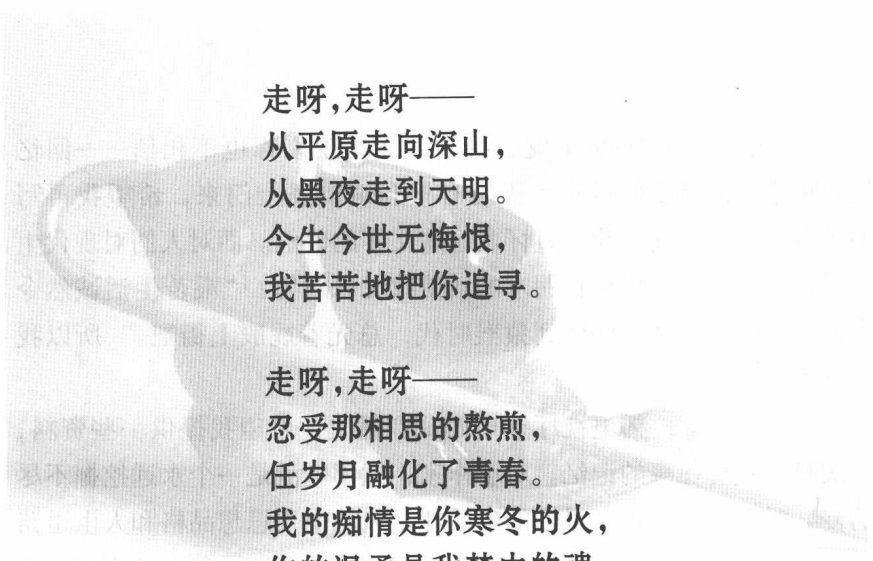
雪山怀抱中的热带风光	(445)
阿底峡——来自孟加拉国的“鉴真和尚”	(457)

我在西藏当记者



怒江源头的天葬奇观	(462)
加查山谷藏汉情长	(468)
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	
——西藏民族简介	(473)

无怨无悔的岁月



走呀，走呀——
从平原走向深山，
从黑夜走到天明。
今生今世无悔恨，
我苦苦地把你追寻。

走呀，走呀——
忍受那相思的熬煎，
任岁月融化了青春。
我的痴情是你寒冬的火，
你的温柔是我梦中的魂。

——摘自作者大型话剧
《亚隆之恋》主题曲《恋歌》

岁月往事细品味

《主人》杂志 1989 年发表我的散文《说来你也不相信——回忆在阿里采访的日子》以后，不时有报刊编辑登上门来，希望我再写些进藏初期的生活。我一直怀疑这些文字的价值。面对人们对现代生活的强烈向往，一位年轻朋友的话使我无以对答：“艰苦生活诚然令人钦佩，但人类总不能回到猿猴时代，总光着屁股上街吧。”所以我一直不肯动笔。

最近，西藏广播电视厅整理西藏广播史，希望我提供一些资料，再次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对于作家，童年生活是一个永远挖掘不尽的梦。对我来说，进藏早期的生活却是造就个人思想品格和人生道路的黄金岁月，使我年过半百仍然不舍离开这片高寒、贫瘠的土地。于是，我又断断续续写出下面的琐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也说不清楚，姑且如实道来，让读者各自去慢慢品味。

排场和苦涩

每个人参加工作的头一天大概都很激动。我来到神奇的高原，踏进西藏广播电台大门的那天，又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小汽车（虽然是嘎斯六八，远不及今日“皇冠”的排场和豪华），更是激动非凡。

时间是1960年10月，一位叫大罗的女同志到招待所（现在的实验小学）一间搭地铺的集体宿舍来找我，我应声站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你就是李佳俊吗？我接你去广播电台上班，车子就在楼下。”同宿舍的尽是待分配的工人，看到专门有小车来接我，都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其实我的行李很简单，几本文学书籍，一个薄薄的铺盖卷，又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步行去单位并不难。大罗打开小车后门，帮我放好行李，相对的两排座位显得特别空旷。我钻进去，既兴奋，又不安，只感到坐着小汽车去机关报到，未免太“排场”了。

抵达广播电台，我又被另一种场面惊讶了一回。当时，广播电台还设在热振林卡一个极其古旧的破院子里。大罗把我带进伙房隔壁的一间“宿舍”，里边密密麻麻地摆着八张单人床，我的行李已经找不到任何存放空间，更不敢奢望一张个人专用的书桌了。

我正在纳闷，大罗已把我的铺盖卷放在墙角一个棕色柜子上（不久我就知道，这宿舍兼做仓库，柜子里放着伙房的大米和清油）。“小李，眼下还没有床，你就睡在这里吧。”我的心绪骤然从小车的天堂中跌落下来，被吓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大罗显然毫不在意这位新来大学生情绪上的变化，立马指挥屋内的两位同志搬来两袋大米，紧紧靠着柜子的另一头，然后用手揉搓麻袋的上部，直至与柜子一般高。柜子盖上积满了污垢，气味令人恶心欲吐。我正寻思要求更换房间和床铺，大罗完全一副大姐姐模样，已经为我解开行李卷，铺开，满意地笑着说：“嘿，长度正好，只是放脚这头还不太平顺，没关系的，过几天给你开个证明，到贸易总公司再买一床棉絮就行了。”

透过薄薄的褥子，我按了按凹凸不平的米袋，确实担心晚上睡不着觉。但新来乍到，又刚享受了一次嘎斯六八，对眼下的床铺不敢有更大的奢望。我躺下试了试，还真能放下整个身子，连连自慰说：“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睡着麻袋加米柜的“床铺”，开始了我在西藏广播电台的漫长生涯。

电子技术面前的困惑

我毕业于大学中文系，语言和文学方面的书读过不少，但对广播技术却是一窍不通，工作中出了不少洋相。

起初，领导分派我负责监听。所谓监听，就是在正式播送节目时打开收音机，看看播出内容有没有什么差错，小的差错要及时记录，以便总结经验，大的差错则要当机立断地终止广播。当时的广播电台只有一个录音室，很多文字节目都由播音员把信号直接送到发射台，早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更是如此。监听责任不小。

由于家境贫寒，我从来不曾与收音机打过交道，只从大街和学校的广播喇叭里听过广播。第一次监听是早上7点半，在编辑部办公的一顶军用帐篷里。天还没有亮，我准时打开了收音机，频率旋钮是头一天晚上请同事固定好了的，不用为选择电台费神。只是音量大得有点震耳欲聋的感觉。这样也好，可以驱走我尚未完全解除的睡意，没想到这对睡梦中的同事却成了一场灾难。首先是住在帐篷侧边的办公室主任刘光兴赤膊披着皮大衣，气冲冲地闯进帐篷：“你开这么大干啥?! 还要不要人睡觉?!” 没想到老干部会发这样大的脾气，只感到莫大的委屈，回嘴说：“收音机声音就这么大，你找它吵去。”刘光兴态度马上缓和下来，走向收音机，调整音量旋钮，声音降了下来，比刚才悦耳多了。返回宿舍前，他笑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小李啊小李，你写文章还可以，玩收音机却是一个傻瓜。”

1961年“五四”青年节前夕，我邀请自治区团委书记鲍奕珊向全区青年发表广播讲话。因为是领导干部来台录音，阎乃一台长事先在办公室与鲍奕珊书记进行了礼节性交谈，然后吩咐我亲自陪同鲍书记去录音室录音。那天，鲍奕珊有些感冒，可能还有点紧张，录音不大顺利，老是咳嗽卡壳。每卡一次壳，我就帮他重新翻开讲稿，还不断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重新讲一遍就是。”鲍书记毫无架子，一切听从我的指挥，每卡一次壳，都要从头开始。不料念稿越来越不

顺利，鲍书记额头上开始冒出一滴滴汗珠。眼看录音无法进行，我只好一个劲指责录音室不好：“唉，这鬼录音室一点都不透气，鲍书记，出去休息一会再录吧！”鲍奕珊到院子里吸烟去了，录音技术员俞永华悄悄告诉我：“前面录的还不错，你不该叫他从头开始，只把打结巴的地方再讲一遍就行了。”我说：“那怎么行？结巴咳嗽都广播出去，叫人笑话，也影响领导的形象。”俞永华笑了笑说：“你放心，我们会做技术处理，咳嗽、结巴很容易去掉的。”我这才从录音的困境中解放出来，知道了电子技术的神通，原来广播里的长篇讲话，都是经技术师在复制间剪接出来的。

其实，在西藏广播事业发展初期，因为很多事情都是第一回，出洋相的远不止我一个。当年，播放电影录音剪辑是电台的重头文艺节目，可以提取最新影片拷贝。有天晚上在电台的院子里放映《五朵金花》，全台职工都有幸露天观赏了这部音乐喜剧片。同时观看的还有工委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大家难得聚在一起看电影，放映前说说笑笑是难免的，直到开映还静不下来。宣传部的那位领导同志很不放心地站了起来，向大家拍拍掌，严肃地宣告说：“今天在录音，请大家看电影时不要说话，把嘻嘻哈哈的声音也录进磁带，广播出去不好嘛。”技术员悄悄向他解释说：“电影片录音没有话筒，外边的声音是进不了录音机的。”

交给谭冠三将军的“介绍信”

我终于悟出了广播的神奇和特点，对采访写录音新闻、录音通讯萌发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1961年“六一”儿童节，编辑部分派我去罗布林卡采访拉萨市少年儿童联欢会。我决定采写出一篇带音响的报道。

那时，广播电台还没有使用干电池的轻便录音机。外出采访，只有几十斤重、用交流电的“钟声”牌录音机，加上话筒、电线、稳压器等附件，一个人是绝对带不走的。“六一”这天，正巧台长要去

工委开会，仅有的那部嘎斯六八不能配属记者使用，办公室为我准备了一辆马车。匆匆吃罢早饭，我和机务组的俞永华坐马车直奔罗布林卡。俞永华工作认真细致；器材准备充足，仅电源线、录音线就装了一个大木箱，足有四十多斤。

正是高原上的仲春时节，天空碧蓝如洗。罗布林卡花红草绿，会场上撑起宽大的帐篷，四周彩旗猎猎。俞永华把录音机放在树荫下，接上电源，做好了录音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10 点左右，演出尚未开始，谭冠三将军突然来到罗布林卡向孩子们祝贺节日。谭冠三是位老红军，进军西藏和平息叛乱都是直接指挥之一，在少年儿童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先到的孩子们喜出望外，潮涌般地扑向老将军，叽叽喳喳，讲个不休。谭冠三笑容可掬，像一个慈祥的老爷爷。未经组织的场面分外感人，我立即捧着话筒，挤进现场，并事先与俞永华约好，待我向他挥手，他就开动机器。

学生们拉着谭冠三的手，簇拥着边走边谈。我拖着长长的录音线紧紧相随，录下了将军和孩子的许多欢声笑语。不料，一群小姑娘极不安分，硬要拽着谭冠三去观赏会场南侧刚刚盛开的牡丹，越走越远，录音线已经绷得很直了。我高声招呼俞永华：放线！放线！俞永华向我摊开两手，表示录音线用尽，已经无能为力。我望着孩子们走去的方向，急得几乎快跳了起来，只想说一句：“谭将军啊，你就照顾一下我的难处吧！”可惜说不出口，只怨录音机放置得不是地方。

谭冠三看到我的困境，终于停下脚步，笑着对孩子们说：“你们看，那个记者叔叔没有线了，正急着哩。我们怎么办？”学生们无言以对，一位女老师机灵地说：“同学们，请谭爷爷坐在那个石桌上给我们讲一个红军长征的故事，大家说好不好？”石桌正是我站立的地方。孩子们齐声答道：“好！”于是，孩子们簇拥着谭冠三回到石桌边上，听老爷爷讲起了红军过草地的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当天晚上播出的节目里，谭冠三将军的故事只用了一个开头，却是整个录音通讯里最动人的情节。

一个月以后的一个黄昏，我有一篇重要会议的新闻稿急于请谭冠三审阅，因为走得匆忙，忘了带记者证，在军区二号楼被警卫拦住死



活不让进。我正向警卫反复解释新闻稿的紧迫性，猛然听到一声：“小鬼，让他进来！”我转过身去一看，谭冠三将军正与几个战士在菜地里劳动，忙走上前去：“二号，我正找你呢。”老将军拍拍手上的泥土，带我走进客厅，一面展开稿子，一面笑着说：“记者同志，今天不用为拉电线发愁了吧！”——我很庆幸，“六一”采访时的尴尬，已经深深印在谭冠三的脑海，成了我得以自由闯进将军府邸的“介绍信”。

在满街“鸭子”叫过以后

平叛改革不久，全国各地支援西藏，一下子涌来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职工。工委的口号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在拉萨掀起一股学习藏语的热潮。不但每个机关举办藏语学习班，广播电台还在一早一晚（上班前，下班后）播送学习藏语广播讲座节目。到时，拉萨街头的广播喇叭毫无例外地要进行转播，一路走去，前后左右尽是“嘎、咔、喀、昂”的声音，整齐而洪亮，气势分外激动人心。当然，也有人对八廓街的广播是否有必要转播藏语讲座提出异议（因为那儿的居民和香客都是藏族群众，并不需要藏语字母的启蒙教育），语言颇俏皮：“只听见满街鸭子叫，却找不到一只鸭子。”

十八军进藏的老同志大都会一口流利的藏话，令人钦佩。当然，也有不那么用心的，我们戏称他们是“十年如一日”，因为机关每次组织学习，都只能编入初级班，从“嘎、咔、喀、昂”学起。

我的老师德庆卓嘎是刚从中央台调回西藏台的播音员，后藏一个贵族的女儿，藏语、汉语都很标准。她见我学习有股子钻劲，是愿意在高原上干一辈子的，特意与翻译组的藏族同志商议，给我取了一个藏族名字“扎西云登”，我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可以翻译成“吉祥的学者”，我既高兴又惶恐。学习不久，德庆卓嘎强迫我今后见面只能用藏语和她对话。一天，我们在街头邂逅，她问我：“扎西云登啦，切让咔巴拍克银（注：这是一敬语，可以硬译为贵腿往哪

儿移动)？”我听懂了，却不知道敬语和一般用语的区别，就顺着她的问话结构回答说：“昂让冲木拉拍克银（注：我的贵腿正往市场移动）。”德庆卓嘎前仰后合笑了起来，告诉我，即使是贵族给自己使用敬语也是不可以的，会叫人笑话。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刚学会几句藏话，我竟然敢到基层采访。春节前夕，我到乃东县克麦乡去。克麦乡发展养猪事业很快，人均养猪一头多，超过了《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我找到了乡农会主任说：“我是广播电台的记者（按：‘记者’的藏语尚未学会，用的是汉语），听说你们的猪养得很好，特地前来向你们学习。”主任先是很高兴，连连问我从哪里来，身体可好，我说从拉萨来。主任一下子沉默起来，许久不再言语，我想应该进入正式采访了，连连提问：全乡有多少头猪？大猪有多少？小猪有多少？一头猪能卖多少钱？等等。奇怪的是主任对什么问题都连连摇头，反复说的就是两句话：“大猪都已经卖出去了，剩下的尽是小猪，现在还不能吃。”

这天采访十分令人失望，对于全西藏的养猪先进乡，我竟一条简明新闻也写不出来。

回到县里，向书记谈起这段采访经历，书记哈哈大笑起来：“记者同志，你肯定没有把来意讲清楚。农会主任机灵着嘞，脑瓜里装着一大堆材料，是不会向记者保密的。”他解释说，这正是节日期间，拉萨、泽当的机关、部队、厂矿听说克麦乡猪多，都纷纷派人来采购猪肉，有的连半大个的猪也要抢着买，已经成了克麦乡的一场灾难。为了发展养猪事业，克麦乡最近对采购人员采取关门主义，自然不敢向意图不明的客人“露富”。——我这才豁然醒悟，原来是藏语尚未过关，农会主任误把我当成拉萨来的大采购员了。

虽然有了自知之明，仍然有逼上梁山的时候。一次，我去亚东县的仁青岗互助组采访春耕生产，那儿住有一个县委工作组，不用为翻译发愁。我独自步行两个多钟头，到了目的地，不料工作组已转移他乡。跑这么远的路，哪有空着两手回去的道理。好在我已经学会了“新闻记者”的藏话词语，互助组长明白了我的来意，接待十分热情。我硬着头皮用藏语、汉语和手语与她交谈，还真记下了不少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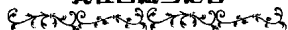
料，写出一篇《亚东山谷春耕生产热气腾腾》的稿件，电台和《西藏日报》很快以头条新闻发出。捧着那张报纸，我算尝到了学习藏语的甜头，不过心里仍扑腾得厉害：天晓得文字里有没有听错的材料。

“雪然风波”

突然涌来那么多大学生、文化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给各项工作注入了新的血液，内地的生活方式也给封闭、质朴的拉萨带来心灵的躁动、战栗。一场不大不小的“雪然风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广播电台掀起来的。

雪然是1960年夏季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援藏的女播音员。二十四岁，能歌善舞，皮肤白皙，特爱梳妆打扮，走路姿态尽展女性风流。到拉萨不久，一个星期日，雪然穿上旗袍、高跟鞋，还抹上口红，戴着耳坠，花枝招展地到贸易公司选购商品。贸易公司紧邻拉萨大礼堂（电影院），即今宇拓路西段，新华书店、人民浴池、理发店、招待所都在那里，是当时干部职工星期日唯一的娱乐休闲去处，摩肩接踵，分外热闹。雪然的出现，在穿着俭朴的众多干部职工中分外夺人眼球，无异于百鸟园中落下一只凤凰。回头率特高自不必说，还免不了引来许多流言飞语，很快轰动了拉萨。雪然刚刚回到广播电台，工委一位副书记的电话也打到了电台领导的办公室，询问雪然的身份来历，要求对她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严加批评。

上面有令，下面不得不从。广播电台领导先是与雪然个别谈话，接着又召开职工大会进行帮助教育，认为描眉毛、抹口红与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份极不相称，是严重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对职工队伍具有极大的腐蚀作用。雪然在会上轻描淡写地进行了自我批评，骨子里很不服气，说自己的穿着打扮是星期天上街高兴，偶尔为之，并未对别人造成伤害；穿旗袍抹口红在北京是很寻常的事，拉萨人不该干预她私人的生活爱好。——这些在今天看来颇有道理的辩解，在当年的政



治气氛下却毫无说服力，只能引起一阵阵嘲讽的笑声。于是，一些同志广泛引用材料继续对雪然进行批判，帮助她提高认识，比如说她对食堂饭菜太挑剔呀，说西藏生活太艰苦呀，嫌老百姓衣服脏呀，等等，都成了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更有甚者，她还给家人写信，说自己 and 丈夫住在一间像门房似的小土屋里，流露出对进藏工作的不满。

雪然夫妇能住上一个单间，在当时的广播电台还算够排场的了。不过，那确实是过去热振小院的门房，土坯垒砌，低矮狭窄，信中的叙述倒是真实的。我常常到小土屋聊天。雪然待人客气，丈夫又是无线电技师，和我们这伙新来的大中专生颇谈得来，帮忙缝个被子钉颗扣子什么的，很有大姐姐的风度。虽然大会批判已经过去，它在雪然夫妇心中留下的阴影却久久难以消散，特别对她给父母写信所使用的词语也被抖搂出来耿耿于怀；而雪然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典型形象，也已深深刻在拉萨干部职工的心中，不是十天半月抹得掉的。雪然工作仍然很认真，播音充满了激情，但是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一直不太协调，一副郁郁寡欢的神情。

“雪然风波”的尾声，是在1962年全国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高潮中，她和丈夫首当其冲地被精简，离开了西藏。回内地不久，雪然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她当了家庭教师，始终对西藏广播电台和高原的同事们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写于1990年，最早选入西藏人民出版社《高原之声》一书）